

# 试论许云樵的学术渊源

廖文辉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 摘要

许云樵为马新知名的东南亚史和东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以乾嘉考据学为其学术研究根基，悠游于东西交通研究和东南亚史。在东西交通研究方面，他拥有此学科以史地考据为主，同时偏重于资料的疏通和与整理的特点，在方法上，他也掌握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法、语言学方法和实地考察法。东南亚史研究方面，除了娴熟于中国载籍文献，他对西方学界的东南亚学的学术传统和资源亦了如指掌，游刃有余。而早期西方和中日汉学家在上述两个领域构筑的成果，更成为许云樵慕仿私淑和对话交流的对象。至于他和新史学千丝万缕的关系，亦可从有限的文献中简略勾勒。

**关键词：**许云樵 东西交通研究 东南亚史 汉学 新史学

## 一、前言

许云樵为马新知名的东南亚史和东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与姚楠和张礼千被誉为马新南洋研究的“三杰”。<sup>1</sup>他涉及的研究领域极为驳杂，除了史学研究外，尚有民俗宗教、音韵语言等的研究。<sup>2</sup>他在1981年离世时留下了庞大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文字遗产上进一步梳理其学术生产脉络，以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与资源，无疑有其学术史上的意义，并可为后来者借鉴，如此对学人的研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论述生产了“什么”，同时更重要的是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

晚近十年学界虽然开始关注研究许云樵，如崔贵强的《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sup>3</sup>，除了详尽论述其生平遭遇，同时也评论其学术成果和贡献，完整细致地呈现许云樵的一生。后来笔者也陆续发表几篇针对性的专题式研究论文，计有《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sup>4</sup>、《许云樵在马新华文源流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局限》<sup>5</sup>、《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sup>6</sup>、《许云樵的历史文献学》<sup>7</sup>、《试论许云樵的交通史研究》<sup>8</sup>。此外，另有台湾成

---

1 陈育龙，〈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访台七日谈〉，转引自 [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139710K](http://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139710K), 2004-11-29。

2 有关研究详见廖文辉，《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新纪元学报》第3期，2006，页1—27。

3 载何国忠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1，页131—175。

4 陈鸿瑜编，《海华与东南亚研究》第4卷第1期，台北：翰芦，2004，页71—92。

5 廖文辉，《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之中心，2005，页143—161。

6 廖文辉，《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页1—27。

7 廖文辉，《许云樵的历史文献学》，载《新纪元学报》第4期，2008，页3-15。

8 2010年12月11日，新加坡南洋学会主办南洋学会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呈《试论许云樵的交通史研究》。

功大学邱彩韵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罗彩绵分别以《马新汉学家许云樵研究》和《南洋大学和南洋研究》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sup>9</sup>在这些论著中只有《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一文是论述许云樵的学术背景，事实上，乾嘉朴学不过是许云樵学术渊源其中一个部分，为此本文将进一步论述许云樵其他的学术生产资源。

## 二、东西交通史的背景

南海古史或东南亚史的研究其实是东西交通史研究的一部分。作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它肇始于19世纪下半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首先，是鸦片战争以后严酷社会现实驱动的结果；其次是晚清域外史地和西北域地研究风气的延续；再次，也是西方和日本汉学刺激下的直接产物。<sup>10</sup>最早以“中西交通史”一词为名，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东西交通史”一名源于近代日本，日本学者将日本与外国的关系所作的称呼。至于中国方面关于中西关系的命名是相当混乱的，直到1930年代初，张星燮和向达分别以“中西交通史”一辞为其著作命名，“中西交通史”的概念才正式确定。此后，这一名称被学界广泛接受和普遍采用，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正式改称为“中外关系史”。<sup>11</sup>

就这学科发展特点而言，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研究内容以史地考证为主，偏重于资料的疏通与整理；（2）研究方法

---

9 邱彩韵，《马新汉学家许云樵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2010；罗彩绵，《南洋大学和南洋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0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页21—33。

11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页3。

颇重考据之学，而又融入近代新的因素；（3）研究方向渐趋专题与细化，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受到重视。<sup>12</sup> 以上三项学门特色，都可以在许云樵的研究上发现，尤以前两项为重。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史地考证无疑成为许云樵的标识，尤其是许云樵早期的研究极为偏重南海古史地名的考证。固然中西交通史不是单纯的地理和交通路线的考证，但考证却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进行研究的必要基础，在起步阶段尤为重要，这是为何在其学术生涯前期如此倾向古史地名考据的原因，即使到了中晚期许云樵对古史地名的考据仍然乐此不疲。在资料的整理方面，此点也很突出，要而言之，主要有如下三项，首先，在文献学上，他校注辑佚好一些中国古籍，而他在书目的整理上是南洋学人中成果较为丰硕的一个；其次，在史学史上，他保存许多南洋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其三，由于对中国载籍和东南亚史料的娴熟，他写了不少有关介绍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文献史料。<sup>13</sup>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许云樵以考据治史，经已在〈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一文中论及，殆无疑意。除了传统中国治学方法，许云樵同时也以中西交通史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法，以及另外两种重要方法——语言学方法和实地考察法。前者既继承乾嘉朴学校勘法“订讹补阙”的基本操作规程，又打破了传统校勘法仅限于以中文资料比证中文资料的格局。这方面许云樵表现的至为明显，除了他本人娴熟的中文资料，同时也大量征引不同语种，如英文、暹文、巫文等的文献。语言学的方法除了以“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的对音法为基础，同时私淑冯承钧等中外学者或汉学家，这

12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页11—20。

13 廖文辉，《许云樵的历史文献学》，载《新纪元学报》第4期，2008，页3-15。

些学者皆借鉴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 1776—1831）、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等西方“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sup>14</sup>许云樵自不免也沾染此考史之技。对音法成为许云樵古史地理研究上其中一个主要的法门。至于实地考察更为许云樵所重，自小性喜旅游，一生周游列国，足迹遍布多处。他的游历常与治学相辅<sup>15</sup>，为撰写北大年史，曾常住北大年八、九年<sup>16</sup>；为写《东南亚通史简编》史前部分，他亲到泰国收集资料<sup>17</sup>。

其三，由于以考史为主，不免流于琐碎，尤其是许云樵早期奠基成名之作，莫不以一地一事一物的考定为重。基本上属于如朱谦之《扶桑国考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梁嘉彬《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1934）等侧重于从地理位置、地理路线和地名等地理因素路子的研究。<sup>18</sup>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内容上，许云樵则较少注意及，这主要是，许云樵南来马新，战后以马新为永久居留国，他更有兴趣的是东南亚的文化

14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页18。

15 廖文辉，《试论许云樵的文艺创作》，2010年8月7—8日，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马来西亚作家协会联办“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提呈。

16 《刘序》，许云樵，《北大年史》，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6。在《北大年史》中，许云樵云：“迦斯之礼拜寺遗迹及铸炮场遗址，余居北大年时，屡往凭吊；其地去今北大年市凡六公里。”为其一证。汪大渊《岛夷志略》言北大年“峰岭内平而外耸”，许云樵认为以为不符，因峰岭在内地而沿海平坦，此亦为其亲历其地之证也。在述侨社活动史一节时，许云樵谓“今能叙其颠末者，仅著者侨居其地之一时期耳。”亦其一证，皆见《北大年史》，页39、107、126。

17 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6，页165。

18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页18—20。

以及东南亚与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关系。<sup>19</sup>

许云樵曾撰文认为：“窃按中西学术界对于南洋史学贡献最大者厥有三人：一为法国汉学权威伯希和氏（Paul Pelliot, 1878—1945）一即暹罗之昙龙亲王（Somdec Krom Phraya Damrong Rajanubhab, 1862—1943），一为吾国译界名宿冯承钧先生。不图三人皆于此三数年内仙逝。”<sup>20</sup> 伯希和为汉学翘楚，许云樵在古史地研究上大量征引其研究成果，自不在话下，但批驳的也颇多。昙龙亲王为东南亚本土学人中有数的异数，著述等身，广为国际学界赞许认可，尤其在暹史方面，可谓乃暹史权威，在暹史研究方面，对许云樵启发不少，但不谙中文，在某些考证论述方面，有其不足甚至谬误的地方，经许云樵指正的也在所多有。<sup>21</sup> 三人之中，对许云樵影响最深刻当为冯承钧莫属，是他最直接师承和学习的对象，对他的论证心悦诚服，对他的批判极少，甚至从许氏著述中不难发现其慕仿的痕迹。

冯承钧（1885—1946），字子衡，1885年生于湖北夏口，早年在比利时修读中学，后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考获法学学士学位。再入法兰西学院研究院攻读两年。在留法期间与当时西欧硕学鸿儒如沙畹、沙海昂、鄂卢梭、伯希和、牟里等交友。又常到

---

19 有关的论著有《中南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载《柔佛中华商会联合会30周年纪念刊》，1977，页112—120；《马六甲琉球通商考》，载《南洋文摘》第10卷第9辑，1970，页618—624；《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载《南洋文摘》第6卷第11辑，1966，页7—11；《印度佛教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载南洋大学编，《贝叶》，第3期，1968，页31—34等是，此不俱列。

20 许云樵，《纪念暹罗昙龙亲王》，《南洋学报》第4卷第1辑，1947，页69。

21 在《中暹通使考》一文中许云樵针对昙龙亲王的暹史考证提出了至少5处的质疑，详见《中暹通使考》，载《南洋学报》第3卷第1辑，1946，页3—35。

巴黎国立图书馆博览群书，得益不少。1911年返国，历任湖北都督府秘书、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1920年出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席及立法编纂委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辑等职。冯承钧通晓英文、法文、佛兰芒文、梵文、蒙古文、越南文和吐火罗文，毕生从事中外交通史的研究，著译丰富，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毕生著译宏富，译作二十多种，翻译论文及著述论文五十多篇。代表作包括《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域史地释名》、《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马可波罗行纪》等。1946年因病逝世，享年61岁。<sup>22</sup>

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的研究上，呈现了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冯氏不仅倾心于中国与南洋之间历程和交通史事的探究，还十分关注中国南洋交通史基本史料的搜罗和汇辑；其次，冯氏广采博引，广泛征引中外载籍，进行慎密的研究、比勘和校注；其三，冯氏善于利用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但不盲从，能一一指出这些成果的错误所在；最后，冯氏十分善于运用语言学方法治史，强调语言工具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在今日考证史地，一须至少具有史地语言之常识；二须广采东西考定学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蠡测之病。”特别指出通晓外国语对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作用，认为“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收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sup>23</sup>以上之研究特点，几全可套用在许云樵身上，如出一辙。往下试举数例看看许云樵对冯承钧的私淑。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谓：“窃以康泰等足迹似未逾满

---

22 整理自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fcj.htm](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fcj.htm) 和 <http://zh.wikipedia.org/wiki/冯承钧>

23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页117—133。

刺加海峡，或曾附扶南船，历游南海诸岛，绝未亲至印度，可断言也。”（页17）许云樵《南洋史》认为：“余更以为康泰等，不特足迹未逾满刺加海峡，抑且未渡金邻大湾（暹罗湾），至多经历湾内各国。”（页83）基本上抄用冯承钧的看法。冯承钧曾谓：“朱应书既全佚，幸有康泰书散见群籍中，欲考吴时南宣国化事，应哀辑其仅存之文互勘之。虽然向觉明（达）有志为此，然未见其辑本。伯希和或有辑本，然未刊布。日本学者驹井义明曾在《所谓孙权之南方遣使》一文中略为钩稽；惜所据者是《说郛》卷16之《扶南土俗》，未免疏舛”（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页16）许云樵承其言：“余尝哀辑之，设并可能为其佚文者亦入之，不难成一残本，是诚中国对南洋研究最古之专书也，爰就所辑，校点疏笺，以通其读。”（《南洋史》，页83）在这个基础上许云樵进行大量的辑佚工作，完成了第2篇第2章第5节《吴时宣化诸国》，有较详细资料的国家共有十数个，其他片言只语的亦不在少数。很明显的这一节的体例他是在模仿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下篇的撰写体例。首先在开始时有一总论说明，这也是他往后辑录徐衷《南方草物状》的基础，往下则将相关国家列出，并把从古籍所辑之资料列出，并于其后加注解和说明出处，书写方式与冯承钧如出一辙。

### 三、对汉学的借鉴

所谓的汉学（Sinology）也被称为中国学，它是指中国以外之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sup>24</sup> 甚至也有学者将汉学称为“支那学”或“东方

24 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10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页2。作者在文中仅指“西方人”所指范围似嫌略窄，故本文以“中国以外之人”代之。



学”，这无疑也将日本、韩国和印度文化涵盖在内。<sup>25</sup>至于东南亚研究，由于西方在二战以前并没有“东南亚”的观念，所以东南亚研究不是被归在汉学领域，就是纳入东方研究的部分。<sup>26</sup>所以在西方的汉学或东方学研究的领域内，存在着东南亚研究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在西方东南亚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它是西方东南亚学走上学术研究的开端，这批学人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依靠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将汉文文献中的记载和其它文字文献对勘考订，对中国海外交通史作出了贡献。作为专业学术人员的汉学家，除少部分有置身其境，大多数皆在殖民母国进行殖民地的研究。他们对东南亚的研究往往伴随汉学而来，由于东南亚古代史的研究必须大量依据中国载籍，西方汉学家在进行汉学研究时不免会涉及东南亚的资料，有者甚至一头栽进东南亚研究领域，成为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权威。<sup>27</sup>由于西方汉学家在这领域内的不俗成绩，往后中国和日本学者也迎头赶上，尤其是方法上大量借鉴了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因此，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清代考据遗风也出现与西方汉学相结合的现象，大大提升了中国边疆舆地，乃至往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水平，<sup>28</sup>并渐浸影响及东南亚研究。可以这么说，西方对东南亚的研究称得上学术研究的，应从汉学算起，东南亚学与汉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依附于汉学之内而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的副产品。

东方古史地的研究，滥觞于19世纪后期，最早是由西方的

---

25 阎纯德，《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阎纯德编，《汉学研究（第一集）》，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页2。

26 许云樵，《五十年来来的南洋研究》，刘问渠主编，《这半个世纪·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檳城：光华日报，1960，页133。

27 梁志明等著，《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页74-83。

28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页33。

汉学家或东方学家通过解读、注释和翻译中国载籍而进行，他们运用语言学方法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其中又以法国最具代表性，成果也最为丰硕。其中尤以伯希和、费琅(Gabriel Ferrand, 1864-1935)与马司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为佼佼者，他们都精通多国语文、著述丰富，其作品多半发表在荷兰的《通报》(*T'oung Pao*)、巴黎的《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与河内的《远东学报》(*BEFEO*)上。<sup>29</sup>

许云樵承时代学术风潮余绪，可从其南洋史地著述以及他的人物纪念文章中窥探其对汉学的借鉴及私淑。从许云樵的南洋古史专著里，我们得知他转益多师，他大量参考了当代汉学家的论点，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他个人的一得之见。许云樵曾谓：“东西学者对于南洋史地考证之最具权威者，东方当推日人藤田丰八，西方则为法人伯希和。”<sup>30</sup>

伯希和是最多产的学者，学识渊博，除了对东南亚古国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外，也对敦煌学有深入的研究。他发表的汉学论文不计其数，其中有关东南亚研究经冯承钧翻译的计有：《郑和下西洋考》、《扶南考》、《交广印度两道考》、《真腊风土记笺注》、《诸蕃志译注正误》、《马可波罗行纪沙昂译注正误》、《中国载籍中之宾量龙》、《关于越南半岛的几条中国史文》等。事实上，他的学术生涯最早的几年是在印度支那渡过的(1900—1904)，他在越南河内的这段期间内，潜心深入发掘汉文资料，以澄清印度支那的历史，他的研究掀起了有关东南亚古史地理的讨论浪潮。<sup>31</sup>

29 崔贵强，《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页146。

30 许云樵，《赤土国考》，《南洋学报》第2卷第3辑，1941，页1-9。

31 许云樵，《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刘问渠主编，《这半个世纪·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页134-135。

费琅是另一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他的名著有《苏门答腊古国考》和《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此外他也发表了许多考定的短文，如《南海中之波斯》、《叶调斯调与爪哇》及《瀛涯胜览中之麒麟》等。他无疑专长于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的考定。至于马司伯乐，他写了一本《占婆史》，并发表了不少富有价值的论文，如《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李陈胡三氏安南之政治地理》与《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等，显然是研究法属印支半岛的专家。<sup>32</sup>

不能忽略的是日本汉学家在这领域的贡献，他们是藤田丰八、足立喜六、驹井义明和高桑驹吉等，其中尤以藤田丰八最著。藤田精通中文，对古代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交通，甚有研究心得。他博览群书，应用综合演绎法，融会贯通，联成一气，共写了14部专书，论文九十余篇，有很多是有关南海的研究，如《狼牙修国考》、《室利佛逝三佛齐及旧港考》、《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及《叶调斯调及私诃条考》，多所发明。

如果以《南洋史》和《马来亚史》二书为据，<sup>33</sup> 约略整理其著述中所引述之汉学家论点的次数，不难发现最常被征引论述的是伯希和、藤田丰八和祈利尼（E. G. Gerini）的论点，其次有费琅、赛岱司（George Coedes, 1886—1969）等人的成果，再次则是史莱格（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昙龙亲王、足立喜六、

---

32 崔贵强，《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页147。

33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这两册基本属通论性质的著述，自然无法如论文般和其他学者反覆辩驳论证，但其中不少有代表性的论点，许云樵都会引用。再加上通论性著述触及面向较广，不似论文专攻一点，也较能放映许云樵认同和反对的实况。

驹井义明和高桑驹吉等人的作品。<sup>34</sup> 伯希和与藤田在两书中皆约有11次被征引，但对伯希和的观点只有两次是认同的，其余9次均属反驳与纠正，藤田则3次认同，8次属反驳与纠正；祈利尼征引约8次，但只有一次认同其论点。费琅和赛岱司的引用虽不及前三者，但基本认同的多，反驳的少。

#### 四、西方东南亚学的掌握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力东渐，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殖民统治东南亚诸国，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对东南亚的了解和记录也远远超越了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国。有关东南亚的书写或研究主要是由观察家、殖民者、汉学家和专业学者四组人员在进行。<sup>35</sup> 所谓观察家是指传教士、冒险家、博物学家和商贾等人，组成的分子较为庞杂，他们以身历其境的个人体验，甚或混杂耳闻之道听途说，编写著述，他们的读者对象自然是对东方有兴趣的欧美人士，大部分的作品并非学术著述，其作用主要在提供讯息，难免存有西方的主观偏见。<sup>36</sup> 殖民者顾名思义是伴随殖民侵略在海外执行殖民母国统治政策的一批行政人员，他们奉行西方的意志，在以西方标准管制的同时，为了更有效统治各自的殖民

---

34 另外，他也撰有《纪念暹罗暹龙亲王》，《南洋学报》第4卷第1辑，1947，页68-69。许云樵，《悼白刺顿（C.O.Blagden,D.Litt）博士》，《南洋学报》第6卷第1辑，1950，页46和《纪念戴文达（Jan Julius Lodedwik Duyvendak）教授》，《南洋学报》第10卷第2辑，1954，页46。

35 有关西方东南亚学详见廖文辉，《西方东南亚学研究溯源》，《南洋学报》第63卷，2009，页9—56。

36 I. A. Macgregor, "Some Aspects of Portugues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on South East Asia", in D. G. E. Hall(ed.), *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72.

地，他们也深入了解所在国的方方面面，除了官方文书档案，也著述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甚至为当地的学术研究首开风气。作为专业学术人员的汉学家，他们对东南亚的研究往往伴随汉学而来，在研究过程中不免涉及东南亚的资料，有者甚至一头栽进东南亚研究领域，成为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权威。<sup>37</sup> 至于专业学者的出现则较为晚近，迟至18世纪后期才逐渐出现以东南亚研究为职志的学者和机构。到了19世纪下半期开始，类似的学者和单位逐渐增多。战后，东南亚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欧美有更多的专业学人投入，至此东南亚研究终于蔚为大国。

许云樵长期浸淫于东南亚研究，不论是南海古史地、暹史、马新史或华侨华人研究，西人留下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数百年来形成的东南亚研究学术传统，自然成为他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源和依据。从许云樵的著述中不难发现，中国文献载籍以外，西方的文献和成果，尤其是英文的资源，成为许氏最常借鉴和采用的资料。甚至可谓与中国的资料同比重。许氏对西方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史了如指掌，曾撰有《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一文，通论1960年代以前东西方东南亚研究情况，是当时这方面研究最早的一篇。对西方学术史和目录学的掌握，无疑替许氏东南亚研究打下深厚基础。许氏对西文资料的应用自如可从战前《北大年史》书后详列的参考书目窥其端倪，其中涉及到语种有英文、荷文、葡文，文献的性质有游历文字、档案、汉学家和东南亚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涵盖了西方东南亚研究的文献资料。

许氏在继承西人学术传统的同时又能与当代学者有所交流和切磋。首先参与英文学界的学术活动，他紧随叶华芬和陈育崧的

---

37 梁志明等著，《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页74—83。

步伐，与姚楠同时申请成为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会员，并在1940年初被马来亚分会理事会通过接纳为会员。并在1947年被选为副会长，并且连任多届。其次许氏和英文学界有互动，进行学术讨论。战前白德尔（R. Braddell）有志于马来半岛古史的研究，并开始撰写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Tim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马来半岛古史研究导论》），期间曾数度约见许云樵讨论扶南时期古国的方位。<sup>38</sup> 此外，许云樵曾考定龙牙门在新加坡的石叻门（Keppel Harbour），此考定也为白德尔赞同。<sup>39</sup> 在众多的西方当代学者当中，白德尔可谓是他心仪和钦佩的学者之一，许云樵曾撰文悼念他，并称誉他为“对马来亚古代史研究最有贡献”者。<sup>40</sup> 他的博雅和对古史地的论述，正是许云樵马来亚史研究上费尽心思欲完成的学术大业，可谓志趣相投，英雄所见略同。

战后，著名东南亚古史研究权威惠尔利（Paul Wheatley）曾经来新加坡访问，与许云樵讨论古史地名的问题，两人相见颇欢，虽然惠尔利在其著述中并没有采用许云樵的观点，但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执教的惠尔利为了纪念是次的美好交情，以示沾沾不忘。在他回国后即在其名著《古代马来半岛的痕迹》（*Impressions of Malay Peninsula in Ancient Times*）书前印上如示之中英文字：“For Hsu Yun-Tsiao，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都是许氏长期进行南洋研究，其成果为西方学界注意及，使之名动国际。许云樵所以能为英文源流学界注意，

---

38 许云樵，《北大年史》，页154。

39 许云樵，《马来亚史》，页93注17。

40 许云樵，《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页142。

主要是他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同时他的文章也有几篇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上面，受到当时西文学者的注意。2007年，为了纪念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成立130周年，特别以东南亚和中国的互动为题旨，选编历来发表在学报上的相关研究成果，共得18篇，其中许氏就有两篇入选。<sup>41</sup>

由于英文学界占据了东南亚研究的前沿和主导地位，译介西文中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无疑成为一个便捷的手段。在1930年代南洋研究滥觞伊始，《星洲日报》的纪念特刊和《南洋研究》、《南洋史地》、《南洋经济》、《南洋文化》等之南洋研究副刊，以及《南洋学报》皆刊载不少译稿。这些译文除部分转译自日文和泰文，大多译自英文著述，除姚楠有大量的译著外，许云樵也进行了不少的汉译工作，如《吉打史大纲》<sup>42</sup>和《吉打考古发现记》的译注<sup>43</sup>，前者为温斯德（R. O. Winstedt）的论文，后者为马来半岛考古学家威尔斯（H. G. Quaritch Wales）的考古报告。此外，许云樵分别连载于《星洲日报·南洋史地》和《星洲日报·南洋文化》译作两种《黄金半岛题本》和《佛罗利氏航海记》，实为专书译介，但其出版则是战后的事情了。<sup>44</sup>战后许云樵也将英文本的《马来纪年》（新加坡：南洋报社，1954）和《马来亚史略》（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1959）汉译，对中英

---

41 这两篇文章是“Notes on Tan-Tan”和“Notes Relating to Admiral Cheng Ho's Expeditions”，详见Geoff Wade(ed.), *Southeast Asia-China Interactions*, Kuala Lumpur: MBRAS, 2007.

42 《星洲日报·南洋史地》，分四期连载，1940年5月2、4、7、9日。

43 《星洲日报·南洋史地》，分三期连载，1940年3月9、12、14日。

44 《佛罗利氏航海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黄金半岛题本》，新加坡：世界书局，1961。

文学界的东南亚研究有沟通作用。

## 五、与新史学的交涉

要详细推论并探讨许云樵和新史学的关系，首先必得对20世纪上半期史学主流新史学的勃兴和发展脉络做一概述和鸟瞰。在清末民初，西学冲击，学风激荡，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吸收近代西方进化论学说、科学实证主义以批判传统史学的风潮，同时出于思想启蒙的要求并建立一个纯学术研究风气的环境业已逐渐形成。当时最早启动并有影响力的是梁启超（1873—1929），他提倡“民史”的撰写，对“君史”、“国史”的旧史进行了抨击，并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与“旧史学”划清界线，<sup>45</sup>这是新史学运动的第一波。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1920年代开始到1930年代，进入了新史学运动的第二波，代表人物为胡适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傅斯年开创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顾颉刚（1893—1980）的古史辩运动。<sup>46</sup>第二和第一波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将历史作为一门自然科学般的学科来看待，这是第一波所不曾思考和见及的。<sup>47</sup>不论是胡适或傅斯年皆主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治学，胡适甚至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口号，傅斯年则高呼“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的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sup>48</sup>成为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前半期的史学主流。

在许云樵的著述中，虽然不曾明确提及他的学术生命曾经

---

45 同上注，页172、179—180。

46 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页378。

47 焦润明，《傅斯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页167。

48 同上注。



受到新史学的影响，但却可在其学术论著的字里行间和活动里，以及一些后人的回忆文章里窥见他和新史学在方法和思想上可能交涉的痕迹。首先，从时代上来看，许云樵成长学习的青少年时代恰好正是新史学从兴起到蓬勃发展的时期。许云樵所处的时代可说是与胡适和傅斯年同时但略后。胡适生于1891年，歿于1962年；傅斯年生于1896年，歿于1950年，许云樵生于1905年，于1931年买棹南来，在完成中小学学业以后，曾留校任教一段时期，并在南来前先后于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和中国公学大学部就读，但仅完成两年的大学课程，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只好放弃学业。在这段期间恰好是新史学风起云涌的时代，而傅胡二人皆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人。许云樵既以治史为其志向，对胡适和傅斯年之倡论新史学当有所耳闻。据许苏吾的回忆：“他好读书，幸得亲友援助，他曾在中国读过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和中国公学大学部，后来因经济不继，便辍学了，但他已学得老师胡适之校长的治学方法，及煮史秘诀。”<sup>49</sup> 胡适曾于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并兼文理学院院长，在这段期间他也担任东吴大学的讲座教授<sup>50</sup>，这段期间恰好是许氏南来马新就读大学的时期，因此许云樵曾经师从胡适应该是可信的<sup>51</sup>，至于详细情况因为文献不足证，则难闻其详了。

其次，从学术的内在特质来看，傅斯年提倡史学家的工作应放在考证历史不要忙着写史，先以考史为功夫，然后达成写史的目标。他也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

49 许苏吾，《许云樵教授生平简介》，《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1982，页15。

50 胡适，《四十自述》（台北：远流，1991），页149—150。

51 李业霖，《许云樵的生平和学术》，载氏著，《读史与学文》，吉隆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0，页209。

材料就不出货”、信而后证，这些史学方法和精神实与乾嘉考据之精神及方法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对考据有所偏好的许云樵大概没有反对的理由。傅斯年认为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重视史料的挖掘和扩充，所以史家必得“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sup>52</sup>，把历史当成科学来处理，认为“史学即史料学”，同时必须吸收一切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sup>53</sup> 这一点，我们在《史学通论》里随处可见许云樵将史料摆在第一位的治学原则。在《南洋学报》的《发刊旨趣》他强调学报的出版除了让学人发表研究心得，它另一个功能还在“搜罗资料，供诸大众”。在《南洋研究》的《发刊词》中，许云樵也特别强调“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的珍贵资料”，而不是酒后茶余的谈助，也不是轻描淡写的空论。<sup>54</sup> 此外，许云樵认为南洋研究者并非就是南洋通，他强调各人应专心于某一部门的精深研究，而不是出一位南洋通来做一部万宝全书。<sup>55</sup> 这与傅斯年先考史后著史的观念异曲同工。

接着我们从许云樵在治学方法上进一步观察和对比他和新史学之间的一些可能瓜葛和相似处。1928年傅斯年为了昭示他办史语所的原因和方针，草拟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1940年《南洋学报》创刊号发行，许云樵以主编的身份写了一篇名为《发刊旨趣》的发刊词。有趣的是在题目上许云樵采用了“旨趣”两字，而不是他往后创刊期刊惯用的“发刊词”未知是否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在其他学科的使用方面，傅斯年要重建古史，不只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而且更看重非文字的地下考古、器物

---

52 焦润明，《傅斯年传》，页168。

53 焦润明，《傅斯年传》，页168-170。

54 《南洋研究》发刊词，页v。

55 《南洋学报》发刊旨趣，页2。

和宫廷档案等非文字资料。许云樵治东南亚史之所愿亦在重建东南亚之古史，他认为如果单凭书本与出土文物，仍然是有所不足的，所以还得辅以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与古代航海有密切关系，不论其气象、新星宿，以及立表测纬等等，皆有助于吾人之校勘考订。”<sup>56</sup> 为了撰写《东南亚通史简编》第二章史前史，虽已完成一半，但为了补充最新泰国出土的文化资料，还专程到泰国以搜集资料。<sup>57</sup>

最后，从学术机构建设上所作的努力来分析。傅斯年认为历史学既然是科学的事业，那么它的研究方式，就应从个人的孤立研究转变成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强调史学研究的“集团化”，从而使史学研究成为一门分工精细的科学研究，进而培养训练一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学者，使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化和现代化。<sup>58</sup> 1941年，许云樵与姚楠等七人发起组织南洋学会。此会组织的缘由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风云密布，马新华社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有鉴于南洋研究的紧迫性，有意发起组织文化团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群策群力，将研究成果呈现出来，以为中国政府制定侨务政策的参考。另外，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使先生和姚楠联想到居留南洋的华侨如此众多，却无一研究南洋问题的学术团体，因此在征求了刘士木和李长傅的意见后，决定与新加坡的同道共同发起组织一学术团体。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其背后一个真正的意图就是要集合众人之力量进行南洋的研究，把长期掌握在西

---

56 许云樵，《据风向考订法显航程之商榷》，《南洋学报》第6卷第2辑，1950，页1。

57 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页165。

58 焦润明，《傅斯年传》，页170-172。

方学人和殖民地官僚手中的历史话语权拿回，积极推动马新本土的南洋研究。由于这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当他在1958年退出南洋学会后，他牵萦梦回的仍是这个理想，所以他在南大组织南洋研究室进行南洋研究的工作和推动南洋研究，继续其未竟之业。当他离开南大后，组织东南亚研究所，继续其理想，先后共出版了7期的《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停刊后，东南亚研究所继续运作，但已是强弩之末，沦为单打独斗的个人秀了。傅斯年创组的史语所，成为史学研究的重镇，引领学界数十载，其影响至今。

本节的论述，虽无直接史料可兹证明，仅靠间接推论演绎。梁启超曾谓对于一时难以弄清楚的历史可以先立“假说”，“假论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sup>59</sup>。胡适也曾说自己有“历史癖”、“考据癖”，认为“假定”越大胆越好，要富于想象力，特别是史料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的时候，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缺损的部分。<sup>60</sup> 举凡一切了不起的科学发明莫不起乎假设，本节之作即秉承梁胡之意，作此大胆的假设，说大胆是因为文献不足证也，希望往后能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证明此论的可信。

如前所述，许云樵成长学习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剧烈动荡转换的时代。在学术上恰好是梁启超以来新史学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北方，许云樵虽人在苏杭一带，不曾北上，但文化兴盛的南方必有所影

---

5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3》，页75，转引自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4，页269-270。

60 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页274-276。

响，更何况考据学和新史学在方法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以说他的成长学习期正是新史学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从时代上来看，很难想象许云樵不受新史学的影响。有此大胆的假设实因为许云樵的学术历程与傅斯年有太多相似之处。傅斯年创办史语所，许云樵则创办南洋研究室和东南亚研究所；许云樵在《南洋学报》的发刊词采用“旨趣”二字又与傅斯年史语所期刊之发刊词《史语所工作旨趣》相同。这些巧合是否透露了某些彼此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在许云樵的著述中看到谈胡适和傅斯年等新史学的文字，在他的众多人物悼念文章中，大多为西方汉学家或马新一地的学者。或许我们只能说许云樵在治学和做研究的路上与胡适和傅斯年有相似之处，但其中有不受傅斯年的影响？抑或完全只是个人治学路子的相近而不约而同的走上同一条道路。在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之前，实在难于武断的说出一个答案来。如果两者互不相关，也只能说是历史的巧合了。

## 六、结论

许云樵为学以传统旧学为底，后来虽然曾入读大学，但并未完成课业，即因家贫而辍学。即便如此，他已经奠定了做学问的坚实根基，并以此进入东西交通研究和东南亚史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乾嘉朴学成为他的煮史技艺或研究方法，而东西交通研究和东南亚史无疑成为他的主要研究内容，而这两种研究内容由于早期一批杰出的东西方汉学家作出了大量贡献，奠定了许多研究基础和解决了不少疑难，常有交叉重叠的现象，许云樵在治史过程中涉入汉学，转受其影响，自然在情理之中。至于许云樵与新史学的关系，虽从其学术生命和著述见其蛛丝马迹，但毕竟文献有所不足，仍有待进一步证明。最后，许云樵性喜游山玩水，寻古探幽，其少部分学术亦渊源于此，但这已经在《试论许云樵的

文艺创作》<sup>61</sup>一文中论及，此不赘述。

(责任编辑：张惠思)

---

61 2010年8月7—8日，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马来西亚作家协会联办“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提呈之论文。

# **An Assessment on Academic Source in the Works of Hsu Yun-Tsiao**

**Lew Bon Hoi**, Centre of Malaysian History, New Era College

## **Abstract**

Hsu Yun-Tsiao was a famous Singaporean scholar in Southeast Asia and East-West Relations Studies, for which his expertise in th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textual sources was widely recognized. On East-West Relations, he was meticulous in his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analyse Chinese and Western sources including attention to linguistic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besides his familiarity with Chinese sources, he was well-versed in the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relevant sources among Western scholars. The literature in both fields of studies built up by earlier scholars from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was to become the subject of his lifelong pursuit. Consequently, arising from his active involvement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ne can detect an intimate relation between Hsu's works and the new trends in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a.

---

**Keywords:** Hsu Yun-Tsiao — East-West Relations Studies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Sinology New History